



毛泽东的语言艺术

□王厚明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钻研文学、历史和哲学，政治家的胸襟与诗人的激情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语言风格。正是这些朴实、风趣、通俗的“大白话”，传播了革命思想，凝聚了革命力量，激励了革命斗志，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在湖南农民运动时期，针对中国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实际，毛泽东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讲农民一听就懂的话。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在阐述群众工作时，讲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些针对工农特点的极其鲜明而朴实的语言，很容易为工人、农民所接受，也有效地传播了革命思想。

毛泽东特别善于学习和运用当地的语言，注重把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融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充分发动

群众，因而很容易被劳苦大众认可。1928年，毛泽东率红军攻占遂川后，为宣传党的主张，逐字逐句修改陈正人起草的《施政大纲》，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讨老婆不要钱”，把“废除债务”改成“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当年，正是这种带烟火气的大白话，把革命的道理和思想播撒四方。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发现问题。”形象地说明充分的调查研究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破解矛盾的必由之路。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充分运用历史典故、寓言和神话来阐述革命理论、宣传革命思想。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拿“曹刿论战”的故事说明怎样以弱胜强；《将革命进行到底》利用古希腊“农夫和蛇”的寓言表达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的决心；《矛盾论》中用《山海经》的“夸父追日”、《淮南子》的“羿射九日”、《西游记》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鬼狐变人的故事，说明“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而“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深奥道理。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列宁也指出，最大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大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毛泽东善用群众语言宣传革命思想的做法启示我们，无论深奥的政治理论还是深远的革命主张，都要适应群众的认知水平和语言习惯，在理论通俗化、语言群众化、形式多样化、载体时代化上下功夫，用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方式，用接地气的形式和生动鲜活的语言宣讲、阐释深刻的道理，才能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走进群众的心坎里，进而产生强大的感染力、穿透力和引导力。

二

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毛泽东搞教育作讲演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而且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的欢迎。

毛泽东在给斯诺讲到自己的家庭时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毛泽东在一次讲话时，把日本侵略中国比作一头疯牛冲进了中国，正面和它直接对抗暂时抗不过，怎么办？靠持久战、游击战和全民族抗战。有扳牛头的，有拽牛尾巴的，有薅牛毛的，有砍牛蹄子的，最后的结果是这头疯牛必死无疑！听课学员在会心的笑声中明晰了党的革命策略，增强了战胜日寇的坚定信心。

《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用“大白话讲大道理”的经典之作。他用形象生动又一针见血、诙谐幽默又以小见大的话语风格，列举了“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等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并在引言中说道：“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可谓入木三分。

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苏联访问，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苏学生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

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讲话中，毛泽东纵论天下，旁征博引，提出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名言。亲切和蔼、风趣幽默的讲话让大厅内充满了欢声笑语。

语言传递情感和理想，也凝聚人心和共识。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不妨学习毛泽东用风趣幽默的群众语言去赢得群众、凝聚共识，多用群众耳熟能详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普遍认可的道理、有目共睹的事实，多讲富有时代气息的话，多讲与群众心贴心、接地气的话，使革命真理、政治理论大众化，让百姓真诚信服、群众广泛认同，从而达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效果。

三

毛泽东的群众语言并非空洞无物、博人一笑的玩笑话，在不同的时期，常常是充满斗争气息、积蓄革命意志的战斗号角。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将革命进行到底！”“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等，虽言简意赅、通俗直白，但却字字千钧、充满力量。

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退至湖南浏阳文家市集中。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了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并作了一番动员：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勇敢战斗，终能用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毛泽东通过小石头与大水缸的关系，阐明要保存实力，不与敌人硬拼，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山区去积蓄力量。这番动员，揭示了革命的艰巨性和最终必胜的信念，既稳定了军心也鼓舞了士气。

针对部队中存在单纯军事思想，只想打城市，不愿待在偏远农村地区，也不愿意进行艰苦的根据地建设等问题，毛泽东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如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他把根据地比喻为可以休息的地方，提高了官兵对建立革命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数十年后，当年的老红军对这段话仍记忆犹新。

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时，毛泽东曾说：“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义正词严又提振士气，极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和最有力征服力的武器是语言。而蕴含真理和追求、潜藏理想和信仰的“大白话”更具磅礴的伟力。借鉴群众语言，创造特殊风格的话语，使之言之有物、言之走心，语言就获得了强大的表达力和无尽的魅力。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学习古代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并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则必然焕发教育人、鼓舞人、塑造人的无穷力量。

（摘自《解放军报》，原标题为《从群众语言中汲取养分——伟人毛泽东的语言艺术》）

探访古田会议会址及旧址群：寻根溯源，重温峥嵘岁月

□冯春梅 倪光辉 颜 珂 黄 超



1929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召开。会前，红四军进行政治军事整训，为会议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会后，毛泽东在古田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初步说明。

古田会议的光芒从何来？近日，记者一行走进龙岩连城县、上杭县，探访古田会议召开前后的红色足迹，重温党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

“新泉整训”：在农村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建设

连城新泉村，榕树冠如云。村口河边，有一棵树龄数百年的大榕树，枝叶向水伸展，树荫能覆百人。

当地人说，红四军曾在树下演讲动员，号召工农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跨过小河，前委机关旧址望云草室、司令部旧址于溪公祠、工农妇女夜校旧址张家祠、军民万人大会台旧址等保存较好，见证着在农村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所走过的艰难道路。

1929年11月，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12月上旬，红四军进驻连城新泉，开展了政治军事整训，史称“新泉整训”。其间，毛泽东根据中央来信的精神和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以及对红四军状况的调查，为这次大会主持起草决议案。陈毅参加决议案起草工作，朱德负责军事整训。

“前委召开大队、支队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士兵、农民等调查会，大家白天搞研究，晚上作总结。”新泉整训纪念馆讲解员周冬梅说，经过集中整训，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为红四军党的九大召开打下了重要基础。

如今，站在军民万人大会台旧址前的空阔草坪，似乎仍能感受到红军战士开展训练的铿锵脚步……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走在田间地头，不少古田群众都能说出当年的革命历史故事。对他们来说，古田会议精神，不只保留在纪念馆里的文字和图片里，更存在于父辈的记忆里……

当年，大会召开之际，敌人向闽西革命根据地等区域部署了三省“会剿”。为确保会议顺利安全，红四军移师上杭古田，这里山多地

险、易守难攻。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九大在当地宗祠改造而成的曙光小学召开，这就是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大会由陈毅主持。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指示信。

各级党代表、干部代表和士兵代表120多人参加了会议，正值严冬，与会代表烧炭取暖。90多年过去，在白墙青瓦的古田会议会址，先辈们探寻革命道路时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会上，大家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在会址北侧，坐落着古田会议纪念馆，建馆以来共接待国内外观众4000多万人次。馆长曾汉辉一边介绍，一边带着记者回顾了决议内容：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的办法。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古田会议精神研究中心负责人林炳玉表示，这些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并对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

距古田会议会址一公里的赖坊村，一座二层砖木建筑静静伫立。这便是协成店，红四军司令部设于此楼。古田会议后，毛泽东从古田八甲村前委机关驻地移住于此。

1930年1月，毛泽东在信中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通过论述，他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该信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就是不朽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通过艰难探索，到1930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地解决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当时，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是全国各革命根据地中力量最强的。10万闽西儿女参加红军——“听党话、跟党走”嵌入闽西人的红色基因。

（摘自2021年1月26日《人民日报》）

中国红色政权的第一份报纸

□王大龙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正式宣告成立。于此前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底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报刊有160余种，目前发现的有130余种。

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创刊了。它是中国红色政权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实际上起着中央党报机关报的作用，社址在瑞金叶坪村。当时的《红色中华》与“红中社”（新华通讯社前身）是“报”“社”一家，两块牌子，一个编辑部。《红色中华》编辑部肩负双重任务：一是编辑、出版《红色中华》，二是利用仅有的一部收报机，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及塔斯社英文广播，编译刻印成“参考消息”——《无线电资料》（后改为《每日电讯》）。报社内设《红色中华》编辑委员会，工作人员最初只有三五个人，编辑人员连新闻台在内最多时也只有12个人。中央执行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周以栗担任了第一任主笔。先后

主管过编辑业务的还有王观澜、杨尚昆、李一氓、沙可夫（陈微明）、瞿秋白（1934年1月以后）、任质斌等人。

《红色中华》报铅印四开，一般出4—6版。它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等内容（社论多为中央党政各部门负责人撰写），以及“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红角”“突击队”“警钟”等栏目，还没有不定期出版的文艺副刊《赤焰》。当红军获得大胜利时，还发号外。《红色中华》发行量最多时达4万份。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开始长征。此时，留守在江西苏区的瞿秋白一边治疗肺病，一边继续出版《红色中华》。1935年1月21日出版到第264期时被迫停刊。

（摘自2016年7月1日《光明日报》，原标题为《党报党刊的风雨历程：1920—1949》）



林祥谦，1892年10月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农民家庭。1922年夏，林祥谦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当选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遭到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破坏和镇压。为抗议军阀的残暴行径，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京汉铁路总罢工，林祥谦被指定为江岸地区罢工总负责人。2月7日，林祥谦带领工人同前来镇压的反动军队进行了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逮捕，捆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电线杆上。面对敌人复工的威逼，林祥谦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献出了年仅31岁的宝贵生命。

林祥谦团结工友、积极宣传党的革命理想，发起建立了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1921年，在陈潭秋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林祥谦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他利用工余时间阅读《共产党宣言》《工人周刊》等书刊，提升阶级觉悟；在党的领导下，他大力宣传“天下工人是一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观点，揭露敌人分裂工人队伍的阴谋，并积极帮助工友解决困难。一次，林祥谦发现一位湖北籍工人家里揭不开锅，孩子饿得直哭，便悄悄回家，

取来家中仅存的十几斤米送给工友。面对父亲的不解，他解释道：“穷人有难要相帮。”经过林祥谦艰苦细致的工作，江岸铁路工人逐渐消除了帮口隔阂，极大增强了内部团结。1922年1月，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林祥谦被选为干事，自此，江岸地区工人的力量愈发强大起来。

1923年2月4日，随着第一声汽笛的拉响，京汉铁路全线客、货、军车一律停驶，震撼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始了。作为江岸地区罢工总负责人，林祥谦带领工人组成宣传队，贴标语、发传单，揭露敌人罪行；成立调查队，了解掌握敌人动态；扩大工人纠察队，赶制铁棍、木棒，准备自卫。2月7日中午，当意识到残酷的斗争即将到来时，林祥谦冒着生命危险把分会的图章藏入自家炭火盆，完成了他牺牲前的最后使命。虽然在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残酷镇压下，这次罢工以失败告终，但它有力地彰显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并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力。

当刽子手一刀刀砍向全身被缚的林祥谦时，已成血人的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

林祥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据可查壮烈牺牲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工人运动先驱。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勇敢坚定、宁死不屈的精神以及全心全意为工人群众求解放的崇高品质，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摘自2020年第7期《党建》）

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

□刘颖

林祥谦：